

#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人口挑战

赵中维

## 一 引言

全球性的人口转变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一转变“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将人口转变作为核心，才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Dyson, 2010）。同样，中国的人口变化不仅与其历史进程紧密联系，而且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从全球视角对中国人口转变进行描述，并考察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发展的主要趋势及面临的挑战。

## 二 世界和中国的人口转变

### （一）20 世纪中期以前的人口变化

人口转变最早发生在欧洲。在 19 世纪初期，一些欧洲国家就出现了死亡率长期下降的趋势。在此后的 150 年中，英国、法国、瑞典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分别从 1800 ~ 1809 年的 37.3 岁、33.9 岁和 36.5 岁上升至 1950 年的 69.2 岁、66.5 岁和 71.3 岁。随着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在 19 世纪中期也开始下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国以及瑞典，1800 年左右出生的人们，还有比较大的家庭规模，每名妇女大约生育 5 个子女。但 1900 年左右出生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就已降到平均每人 2 个子女（Livi-Bacci, 2007）。根据

联合国有关部门的资料，欧洲、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基本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其出生时预期寿命已达到 66 岁，总和生育率（TFR）下降至大约每名妇女 3 个子女（UN，2009）。在人口转变早期，死亡率和出生率的下降都比较慢，且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实现。这就使得社会和政府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这些变化并应对由此带来的各种影响。

相比之下，人口转变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开始较晚。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仍然保持着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联合国有关资料显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这些国家（不包括中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大约为 41 岁，总和生育率（TFR）为每名妇女超过 6 个子女（UN，2009）。

中国曾是具有上述人口特征的典型国家。根据 1930 年左右对中国农民的一项调查，人口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大约只有 25 岁，总和生育率为 5.5 左右（Barclay 等，1976）。在 20 世纪上半叶，尽管中国一些城市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全国人口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可能低于 35 岁。20 世纪 40 年代末全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大约为每名妇女 5 至 6 个子女（Campbell，2001；Zhao，1997）。

实现人口转变之前的高死亡、高生育对社会经济发展有许多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之一就是高死亡对人力资源所造成的巨大浪费。这种浪费直接导致了当时经济的缓慢增长。例如，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在中国农村人口高死亡率的影响下，超过 40% 的子女不能活到 15 岁。因此，为了确保有一个儿子活到结婚年龄并传宗接代，平均每对夫妇就需要生育至少 5 个子女。于是，妇女就不得不在其生育年龄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怀孕、分娩并照顾子女。然而，这些妇女及其家庭的努力和投入有很大一部分由于子女的早逝而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由于这些原因，人口转变前的社会经常出现的经济增长缓慢也就不足为奇了。

## （二）20 世纪下半叶全球性的人口转变

如图 1 ~ 图 4 所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工业化国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持续下降。到 20 世纪末为止，出生时预期寿命从 66 岁左右上升至 75 岁左右，总和生育率则从每名妇女大约 3 个子女降至 1.6 个。由于这些

变化,以及国际迁移的影响,世界上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人口总数由1950年的8.12亿增加到2000年的11.95亿。与此同时,其年龄结构逐渐变老。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8%左右上升至14%以上。不过,由于生育率下降,这些国家的总抚养比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在此,总抚养比用0~14岁和65岁以上的人口之和(即受抚养人口)与15~64岁人口(即工作年龄人口)的数量之比来衡量,以每100名工作年龄人口所负担的非工作年龄人口数量来表示。在1950~1975年间,总抚养比在55左右波动,此后稳步下降至2000年的49(UN,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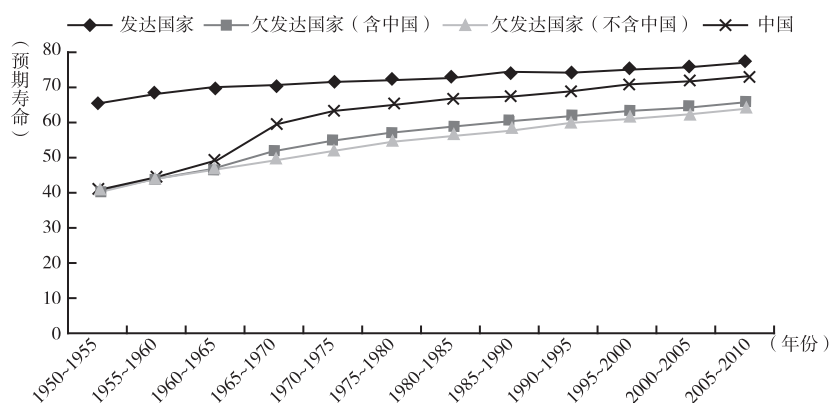


图1 出生时预期寿命的变化

资料来源: UN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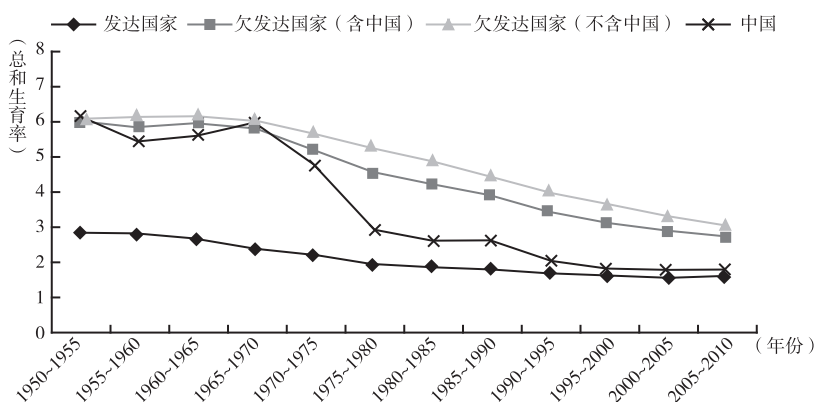


图2 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 UN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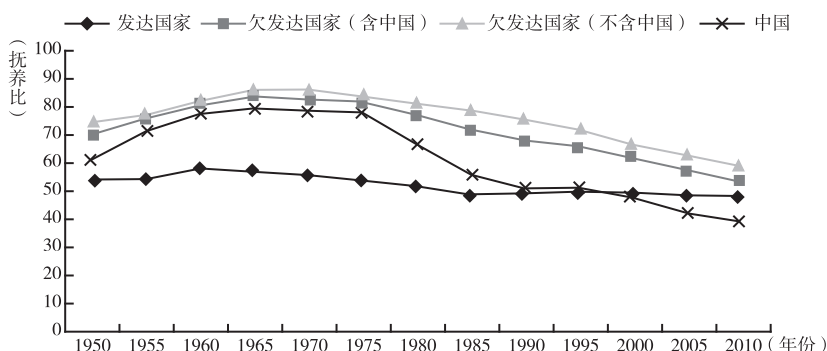


图3 抚养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UN（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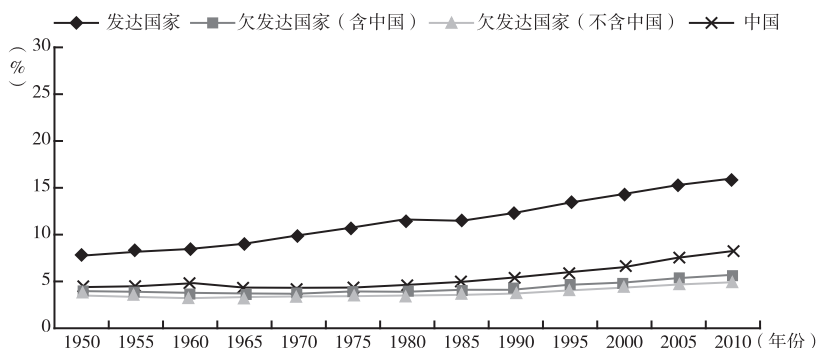


图4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UN（2009）。

欠发达国家（不包括中国）的人口转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或者开始加速。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预期寿命从41岁上升至61岁，总和生育率从每名妇女6.1个子女降至3.6个子女。当然，欠发达国家人口转变在速度和幅度上有很大差异。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最快的是东亚。最不发达国家却远远落后，到了20世纪末时其预期寿命只有52岁，总和生育率约为每名妇女5个子女。1950年至2000年，欠发达国家（不包括中国）的人口规模从12亿增加到36亿（如果包括中国在内，则从17亿增加到49亿）。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些国家的抚养比在这段时间中大多超过70，高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一现象主要是由这些国家的高生育率所致，因为

其直接引起子女抚养比的上升。由于同样的原因，很多欠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人口年龄结构都保持了年轻，或出现了人口结构的年轻化（UN，2009）。由此造成的高抚养比成为很多欠发达国家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 （三）中国人口转变与近年来的经济增长

20 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发生的人口转变与其他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大致相同，中国的变化更迅速，幅度也更大。

除了大饥荒期间，中国的高死亡状况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得到了迅速改善。根据班尼斯特（Banister）的估计，1957 年的出生时预期寿命达到 50 岁左右，1970 年达到 61 岁，1981 年达到 65 岁。这些数据与联合国有关部门的计算结果（如图 1 所示）非常接近。但中国官方数据表明，这一时期的死亡率下降可能更快些（Banister，1987；Huang 和 Liu，1995）<sup>①</sup>。这些成就，连同斯里兰卡、哥斯达黎加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口所经历的死亡率下降一起，被普遍认为是贫穷国家提高人口健康水平的成功之路（Caldwell，1986）。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死亡率进一步降低。全国人口的出生时预期寿命现在已达到 74 岁（Ren 等，2004；UN，2009；Zhao 和 Guo，2007）。虽然近年来中国的死亡率下降速度比早些年慢了，但这种进步比一些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或东欧国家的死亡改善情况还要显著得多。这些中亚或东欧国家的死亡率在近年来的社会变革与重建中保持不变，有的国家死亡率甚至有所上升（Meslé，2004）。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尽管中国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但全国生育率水平仍然很高（Lavelly 和 Freedman，1990）。高生育率和下降的死亡率导致了人口迅速增长。面对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性计划生育运动。这对将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之下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中国总和生育率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还保持在每名妇女 6 个子女左右，到了 1980 年就已降至每名妇女 2.5 个子女左右。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生育率似乎停止了下降，总和生育率在 2.3 至

① 根据中国人口信息与研究中心的资料，中国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在 1957 年就上升至 56 岁，70 年代初达到 64 岁，1981 年就达到 68 岁。

2.9 之间波动 (Yao, 1995)。但从 90 年代生育率出现了进一步下降。总和生育率在 1991 年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到 2000 年进一步降至不足 1.6。很多研究显示, 近年来中国生育率一直处于这样低的水平, 或更低。这一点已被最近发布的 2010 年人口普查初步结果所证实 (Cai, 2008, 2010; Guo 和 Chen, 2007; Retherford 等, 2005; Scharping, 2005; Zhang 和 Zhao, 2006; Zhao 和 Zhang, 2010; Zheng 等, 2009)。但是, 如图 2 所示, 这些研究结果与联合国近年来估计的结果存在明显差异<sup>①</sup>。

与其他经历类似人口转变的国家一样, 中国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形成了一个“人口窗口”。如图 3 所示, 根据 2008 年联合国的中方案人口预测, 虽然中国的总抚养比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接近 80, 但在此后就一直下降, 现在已经降至 39 (UN, 2009)<sup>②</sup>。由于这样一种有利的年龄结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口条件, 它被普遍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 中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是自然而然的。

### 三 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主要人口挑战

#### (一) 21 世纪初的世界人口地图

近几十年来世界性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已经引起了很多重大变化。如果我们采用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分类, 显而易见, 现在的世界人口地图已与 50 年前大不相同。

20 世纪 50 年代初, 接近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 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欠发达国家。在 2010 年, 发达国家的人口降至不到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欠发达国家的人口所占比例则超过五分之四。而且此时欠发达国家人口已是 1950 年世界人口的两倍多。这种趋势在未来 40 年仍将继续。

① 如联合国 2010 年人口预测的初步结果所示, 该期的人口预测已经采用了较低的生育率估值。下文会谈及这一点。

② 由于联合国 2010 年人口预测的最终结果还未公布, 这里的大部分分析还是以 2008 年联合国的中方案人口预测结果为基础。因为联合国人口司 2010 年人口预测的最终结果极有可能以较低的生育率估值为依据, 这个最终结果会与 2008 年的结果有一些差异。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总的来看, 与 50 年前相比, 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出生率和死亡率方面的差距已经缩小。在 1950 至 1955 年间, 欠发达国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仅相当于当时发达国家的 62%。而在 2005 至 2010 年间, 欠发达国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达到 66 岁, 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85%。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同样, 2005 至 2010 年间, 欠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为 3.3, 而发达国家则为 1.6。与 1950 至 1955 年间相比, 这一差距也缩小了许多。尽管未来人口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但是在今后 40 年中这两类国家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可能会进一步接近。

在过去 50 年里, 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都在下降。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虽然欠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下降幅度更显著, 但仍比发达国家要高一些。这主要是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儿童抚养比高。在这 50 年中, 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年龄结构都开始老化。发达国家的年龄中位数从 1950 年的 29 岁上升至现在的 40 岁。欠发达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则从 22 岁上升至 27 岁 (UN, 2009)。

发达国家在未来 40 年中可能会出现如下人口变化: 其死亡率将会继续下降, 而生育率可能在较低的水平上波动。由于这种变化, 这些国家的人口总量将接近 13 亿, 而且保持相对稳定。不过, 发达国家在世界人口中的份额将进一步缩减至不足 14%。这些现在被认为“发达”的国家在人口方面的影响力将会大大降低。此外, 如图 5 和图 6 所示, 这些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会变得更为老化。其 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现在的 15.9% 上升至 26.2%。而这一变化会引起总抚养比大大提高, 即从现在的 48 上升至 2050 年的 71。由于总抚养比的提高, 以及低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力短缺, 一些国家的移民数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比较而言, 欠发达国家未来的人口变化明显不同。这些国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会进一步下降。由于相对较高的生育率和年轻的年龄结构, 其人口会继续增长。到 2050 年, 欠发达国家人口将接近 80 亿, 占世界总人口的 86%。如图 5 和图 6 所示, 这些国家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将加速, 但由于儿童抚养比的下降, 其总抚养比会保持在目前水平, 或者稍低一些。很多欠发达国家将会从这一变化中获益。除此之外, 许多国家将经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大规模的城乡迁移可能伴随着其未来的经济增长。

当然, 在联合国的分类中被认为“欠发达”的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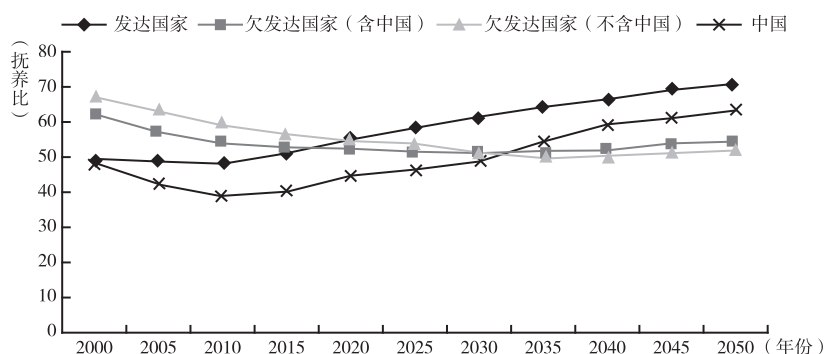


图5 抚养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UN（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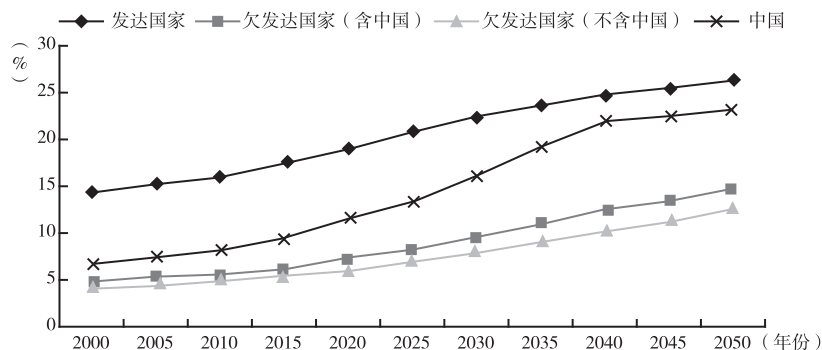


图6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UN（2009）。

平和人口转变阶段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依然存在。虽然它们中的一些国家现在比其他欠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更接近发达国家，上述分析及其主要结论仍然能简要概括过去50年世界人口的变化及其在不久将来的主要趋势。

## （二）未来中国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

当前中国人口状况如何？其未来变化趋势怎样？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相比，中国人口现状和变化趋势又有何不同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变化可能出现的若干特征。与受诸多



因素影响而经常难以预测的经济社会发展相比，中国的未来人口变化具有下列显著的不同点。

人口变化只由很少几个人口因素决定。中国未来的人口变化也不例外。如果仅就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而言，它们只是由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所决定。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国际移民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显得微不足道。虽然内部迁移会大大改变人口空间分布，但对全国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没有影响。

而中国未来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可能并不剧烈，而是相对缓慢和稳定的。中国的死亡率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迅速下降，生育率则在 70 年代下降的幅度也很大。而这样的变化在未来的一二十年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如果没有受到灾难性的传染病、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的侵袭，中国的死亡率将会稳步下降或者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与此相似，生育率可能出现小的波动，而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大起大落。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未来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可能缺乏“弹性”。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可以比较容易地刺激或调节某一特定经济状况或经济活动。与此不同，政府的政策或者其他形式的干预却不太可能使得未来的生育率和死亡率趋势因此发生剧烈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全国性的计划生育运动的确促使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但是现在中国人口的主要挑战不再是生育控制。时至今日，也没有证据表明，适当的生育刺激政策能使生育率已降至很低的国家恢复到可持续的更替生育率水平。

人口惯性同样会影响未来的人口变化。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尽管中国的生育率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其人口在过去 20 年还在增长，而且这一趋势还将持续至少 10 年。同样，在中国人口规模开始下降以后，即使生育率上升到比更替水平略高的程度，人口规模下降趋势也不会很快停止。而且，即使存在能有效提高生育率的政策或干预手段，生育率的调节也只能在大约 20 年以后才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上述原因，未来中国人口的变化比其社会经济发展更容易预测。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和影响，中国的主要人口变化趋势已经构成了未来 25 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背景，并将对其产生重大影响。

### （三）中国未来的人口趋势

那么，中国人口在未来几十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第一个是全国人口的变化。根据联合国 2008 年中方案人口预测，中国的全国人口在 2010 年约为 13.5 亿<sup>①</sup>，在 2030 年将达到 14.6 亿，然后就会开始下降。到 2050 年，中国人口将会降至 14.2 亿（UN，2009）<sup>②</sup>。虽然中国人口还要继续增长 15~20 年，但是到 21 世纪 20 年代中期将会把“人口最多国家”的称号让给印度。而且，中国人口未来的增长幅度将会比过去 50 年小得多。而人口增长的本质和主要特征也会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大大不同。目前的人口增长是由过去人口变化形成的人口惯性造成的。在这一增长的表象之下，已经出现了负的内在增长率<sup>③</sup>。因此，尽管仍在继续的人口增长还会对各种资源和经济增长形成一些压力，但对长期发展来说，这种增长已不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

第二是工作年龄人口（即 15~64 岁的人口）也会发生类似变化。根据联合国 2008 年中方案人口预测，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在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将达到 10 亿左右的最大值，此后开始下降，到 2050 年会下降 1.3 亿。工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会下降得更早，从目前的 72% 降至 2050 年的 61%。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城镇人口，将在 60 岁之前或在 60 岁时退休，15~59 岁的人口数量变化可能与许多政策更加密切相关。根据联合国 2008 年人口预测，15~59 岁人口的比例在 2010 年达到 68%，现在已经开始下降<sup>④</sup>，到 2050 年将减少 1.6 亿。在未来 40 年，较年轻的工作年龄人口（15~24 岁）下降尤为明显，将下降 8000 多万，或 36%。中国工作年龄人口也将因此变得更为老化（UN，2009）。

---

① 根据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人口）为 13.4 亿（NBS，2011）。

② 这些结果很可能高估了中国未来人口增长。下文将会进一步探讨这一点。

③ 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人口变化：第一是看总人口增加还是减少，第二是看一代人能否实现自我更替。后者通常用一组妇女能否生育足够多的女儿以接替她们来衡量。由于年龄结构的影响，第二种考察中得出的内在人口增长及变化特征可能与第一种考察中所得出的关于人口增长的结论不同。

④ 根据最近的中国人口普查，2010 年 15~59 岁人口的比例略高一些，为 70%（NBS，2011）。

第三个主要人口变化趋势是，中国生育率在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保持在低于或者大大低于更替生育率的水平。这一趋势将对长期的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生育率上升可以阻止中国人口下降。的确，近来一些学者也在建议中国政府改变生育政策。不过，必须认识到，虽然限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仍然存在，但这已不再是目前中国低生育率的根源，或主要原因。有证据表明，在中国，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文化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希望建立较小的家庭，或者根本不想生育子女（Cai, 2010；Gu 和 Wang, 2009）。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许多国家的生育变化趋势一致，并且与近几十年一些东亚国家的人口变化非常相似。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与很多国家相比，中国的结婚年龄相对较低，不结婚的人口比例很低，从而不生育的人口比例仍然很低。不过，在不久的将来所有这些情况都可能发生变化。独身增多、晚婚和无子女人口比例的增加可能很快成为中国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由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中国内在人口增长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已经变为负值。在联合国 2008 年人口预测所采用的假设条件下，预计中国人口从 21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开始经历长期的下降。这一下降在 21 世纪之内都将继续，而且很可能持续到 22 世纪。

中国人口变化的第四个主要趋势是人口迅速老龄化。如图 5 所示，现在中国的总抚养比只有 39（可能是最低纪录）。虽然总抚养比以后会略有增加，但是仍将低于 1985 年以前的水平，而且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在未来 25 年可以继续从其人口红利中获得收益。不过，中国老年人口和老年抚养比将会迅速增加。根据联合国 2008 年人口预测，2010 年中国 65 岁以上的人口数量为 1.11 亿<sup>①</sup>。在未来 40 年，这一数字会继续增长，在 2050 年将达到 3.31 亿。如图 6 所示，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将从 8% 增至 23%。80 岁以上人口数量将增长更快。到 2050 年，这一年龄组的人口将从现在的不足 2000 万增加到 1 亿多。正是由于这些变化，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将从 2010 年的 34 岁上升至 2050 年的 45 岁（UN, 2009）。就人口老龄化而言，中国的情况将与工业化国家非常类似。

第五个主要变化趋势就是城市化和人口迁徙的增加。与很多国家情况不同，在中国，离开家乡到其他城市和地区的人群通常指的是“流动人口”。

① 这一数字比 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结果大约低 700 万。

这些流动人口中的很多人，包括他们的家属，不能享受与当地居民同样的权利。主要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在居住和就业方面往往并不稳定，并经常在户籍所在地和工作地之间奔波往返。因为难以界定城市人口和迁移人口，难以对流动人口进行登记与监测，在判断中国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规模及其未来变化趋势方面，存在相当多的不确定性。不过，中国官方和学术界普遍认为，现在中国国内迁移达到了前有未有的规模，而且城市化速度将会加快。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的初步结果，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 2.21 亿，而总人口中有近一半居住在城镇（NBS，2011）。即使按得出较低数值的联合国预测，2010 年的中国城市人口也已超过 6 亿，占总人口的 47%；到 2050 年则可能增加到 10 亿多，占那时总人口的 73%（UN，2010）。

#### （四）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以上讨论的大多数人口变化将在未来几十年发生，这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从人口学角度看，创造并保持可持续的、总体有利的、相对稳定的人口条件，是促进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之一。政府促进和维护这种有益于发展的人口环境的关键一步，就是密切监测人口变化并通过有效指导和干预及时降低可预防的人口负面影响（例如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剧烈波动以及极低的生育率）。虽然预测未来人口变化相对容易，但是如果没有关于当前人口状态的准确数据，就不可能得出可靠的预测结果。在这方面，当务之急就是解开关于中国近来生育率水平和人口规模的谜团。

中国政府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 1.8 左右，并强调在未来 30 年要将生育率保持在这一水平（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2007）。然而，大多数人口学家认为，中国总和生育率在 1995 年就低于 1.8，在 2000 年约为 1.6，而从那时起可能变得更低，大约为 1.5。他们又指出，中国总和生育率在今后一段时期可能仍低于 1.8（Cai，2008，2010；Gu 和 Wang，2009；Guo 和 Chen，2007；Retherford 等，2005；Scharping，2005；Zhang 和 Zhao，2006；Zhao 和 Guo，2010；Zhao 和 Zhang，2010）。由于上述原因，关于中国目前和未来人口规模的各种估计差异很大。例如，根据中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国人口现在接近 13.5 亿，2020 年将增至 14.3 亿，并于 2033 年达到峰值，约为 15 亿（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2007）。这些结论与联合国 2008 年中方案人口预测结

果非常相似，但是与以较低却更为可靠的生育率估值为依据的 2010 年联合国人口预测初步结果和最近美国人口普查局预测结论大相径庭。（UN，2009，2011；US Census Bureau，2011）。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中国人口现在大约为 13.4 亿，2025 年达到峰值，约为 14 亿。而在 2033 年中国人口约为 13.9 亿，比中国政府的相应预测结果少了近 1 亿。至于 2050 年的中国人口规模，2010 年联合国人口预测的初步结果比其 2008 年的预测同样少了 1.2 亿（UN，2009；2011）。以上不同预测结果在生育水平上的差异达到 20%，在人口规模上达到 1 亿。这么大的差异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规划和战略制定将产生深远影响，也绝不能忽视。为了解决这些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混乱，必须花大力气完善中国人口数据的收集，并努力提高其数据质量。

遗憾的是，由于无法获得联合国 2010 年人口预测的最终结果，作者还不能依据这些结果对本文中的问题进行讨论<sup>①</sup>。如果能使用这些结果，与联合国 2008 年人口预测结果相比，中国总人口规模和工作年龄人口就会下降更早，下降幅度会更大。老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则会增加更快，上升更多。而人口下降的惯性则会持续更久。这些结果的影响因而会更严重。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需要慎重对待非常低的生育率所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并相应采取有效的干预政策。

在 21 世纪，至少在上半叶，中国最重大的人口变化之一就是老龄化程度加深。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老龄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大人口成就的产物：一是有效根除过早死亡和延长寿命，二是有效控制生育以及避免非意愿怀孕。由于死亡率将继续下降，而生育率可能保持在较低水平，老龄化可能是未来发展中的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不是在特定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因此，尽管讨论防止和延缓老龄化在短期或者对于某一小规模人口来说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是思考如何应对这一新的人口环境却更重要。作为人口转变的成就，寿命延长和人口老龄化为个人和社会都带来巨大益处。除了许多学者所提出的人口红利（Mason 和 Tomoko，2004；Wang 和

---

① 虽然本研究也可以依据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但是普查的详细结果仍未公布。由于需要考虑将中国、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化进行对比时的一致性问题，本研究选择使用联合国 2008 年中方案人口预测结果，而不是进行新的预测。

Mason, 2007), 这些变化为人们在一生中增加健康的生活年数提供了机会。虽然这些发现还没有定论, 但是很多研究表明, 随着寿命延长, 总预期寿命中健康生活年数所占比例已经上升。人们现在可以将其一生时间的更大比例用于生产或其他创造性活动。这反过来有助于克服迅速老龄化带来的困难。从长期来看, 老龄化导致的困难不能靠提高生育率 (高于更替水平) 或移民来解决。只有加快经济发展, 调整有关经济和社会政策, 并逐步建设老龄化的社会所必需的设施, 建立必需的社会机制, 才能解决这些困难。

中国面临的另一重大变化就是城市化加速和迁移人数的大幅增加。按照国际标准, 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不算高, 但是乡城迁移 (虽然可能是暂时性的) 和城市化的规模巨大。中国能否成功应对未来的城市化, 是保持其发展势头和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长期以来, 中国的发展政策以城市为中心, 农村剩余劳动力则成为调节城市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后备军。虽然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群很难享受到同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 他们却常常因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受到责难。这不仅妨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而且可能成为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由于中国迁移人口流动的特性以及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和双重社会政策所造成的影响, 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和乡城迁移不仅仅是人口过程或者经济过程, 而是政治、经济、社会和人口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革。

## 四 结论

全球性人口转变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国人口转变比发达国家起步晚, 但是进展更快。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迅速下降, 中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现在已经达到 74 岁, 总和生育率早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 而抚养比也降到很低的水平。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已大大受益于这一有利的人口条件。不过, 中国的人口变化不会就此停止。经过 20 世纪下半叶的空前增长之后, 受生育率下降 (尤其是在过去 20 年, 其水平已低于更替水平) 的影响, 中国总人口将很快开始长期的下降过程, 工作年龄人口则会下降的更早。由于这种原因, 以及迅速的老龄化, 中国的抚养比将上升。对于经济增长来说, 未来中国的人

口条件将不如近年来的情况那么有利。此外，中国还将面临大规模的乡城迁移和迅速城市化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制定更加务实的战略来创造和保持可持续、总体有利和相对稳定的人口环境。这对于国家的繁荣昌盛和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 致 谢

作者感谢赵家莹帮助绘制本章的所有图形。作者也感谢澳大利亚科研基金委员会提供的部分资助（DP1096696）。

## 参考文献

- Banister, J. (1987),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 Barclay, G. W., Coale, A. J., Stoto, M. A. and Trussell, T. J. 1976, "A reassessment of the demography of traditional rural China", *Population Index*, vol. 42, no. 4, pp. 606 – 35.
- Cai, Y. (2008), "An assessment of China's fertility level using the variable- $r$  method", *Demography*, vol. 45, no. 2, pp. 271 – 81.
- Cai, Y. (2010), "Social forces behind China's 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 government policy 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6, no. 3, pp. 419 – 40.
- Caldwell, J. (1986), "Routes to low mortality in poor countr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2, no. 2, pp. 171 – 219.
- Campbell, C. (2001), "Mortality change and the 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 in Beijing, 1644 – 1990", in T. Liu, J. Lee, D. S. Reher, O. Saito and F. Wang (eds), *Asian Populatio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Dyson, T. (201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Zed Books, London.
- Gu, B. and Wang, F. (eds) (2009), *An Experiment of Eight Million People*, [i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Beijing.
- Guo, Z. and Chen W. (2007), "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Mainland China", in Z. Zhao and F. Guo (eds), *Transition and Challenge: China's popul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Huang, R. and Liu, Y. (1995), *Mortality Data of China Population*, [in Chinese], Data User Service, China Population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 Lavelly, W. and Freedman, R. (1990),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fertility decline",

*Demography*, vol. 27, pp. 357 – 367.

Livi-Bacci, M. (2007), *A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 (Fourth edi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Oxford.

Mason, A. and Tomoko, K. (2004),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wo demographic dividends*, Economics Series Working Papers No. 83, East-West Center, Honolulu.

Meslé, F. (2004), “Mortal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g-term trends and recent upturns”, *Demographic Research (Special Collection 2)*, pp. 45 – 70.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2011), *The Sixth National Census*, Bulletin No. 1, China Statistics Press, Beijing, viewed April (2011), < [http://www.stats.gov.cn/tjfx/jdxf/t20110428\\_402722253.htm](http://www.stats.gov.cn/tjfx/jdxf/t20110428_402722253.htm) > .

National Strategy 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2007), *The General Report on China's National Strategy 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Ren, Q., You, Y., Zheng, X., Song, X. and Chen, G. (2004), “The levels, patterns and regional variations in mortality of China since the 1980s”, [in Chinese],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no. 3, pp. 19 – 29.

Retherford, R. D., Choe, M. K., Chen, J., Li, X. and Cui, H. (2005), “Fertility in China: how much has it really declined?”,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no. 1, pp. 57 – 84.

Scharping, T. (2005), “Chinese fertility trends 1979 – 2000: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irth numbers and school data”, [in Chinese], *Population Research*, no. 4, pp. 1 – 15.

United Nations (UN) (2009),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 (2010),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9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 (2011),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 Census Bureau (2011), *Preliminary Results for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0*, Population Division, US Census Bureau, Washington, DC, viewed March 2011, < <http://www.census.gov/ipc/www/idb/country.php> > .

Wang, F. and Mason, A. (2007), “Population ageing: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Z. Zhao and F. Guo (eds), *Transition and Challe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Yao, X. (1995), *Fertility Data of China*, [in Chinese], 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Zhang, G. and Zhao, Z. (2006), “Re-examining China's fertility puzzle: data collection and quality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2, no. 2, pp. 293 – 321.

Zhao, Z. (1997), “Demographic systems in historic China: some new findings from recent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Population Association*, vol. 14, no. 2, pp. 201 – 232.



Zhao, Z. and Guo, F. (2007), “Introduction”, in Z. Zhao and F. Guo (eds), *Transition and Challenge: China's popul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Zhao, Z. and Guo, Z. (2010), “China's 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 a further exploration”, *Canadian Studies in Population*, vol. 37, pp. 525 – 562.

Zhao, Z. and Zhang, X. (2010), “China's recent fertility decline: evidence from reconstructed fertility statistics”, *Population*, vol. 65, no. 3, pp. 451 – 478.

Zheng, Z., Cai, Y., Wang, F. and Gu, B. (2009), “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 and childbearing inten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 no. 3, pp. 329 – 347.

(高建昆 译)